

德国统一史

第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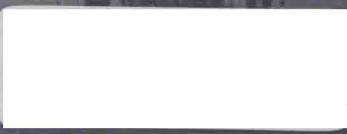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 (Band 1)

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 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

Deutschlandpolitik in Helmut Kohls Kanzlerschaft:
Regierungsstil und Entscheidungen 1982-1989

〔德〕卡尔·鲁道夫·科尔特/著
(Karl-Rudolf Korte)

刘宏宇/译
刘立群/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德国统一史

第一卷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Einheit (Band 1)

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 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

Deutschlandpolitik in Helmut Kohls Kanzlerschaft:
Regierungsstil und Entscheidungen 1982-1989

[德] 卡尔-鲁道夫·科特/著
(Karl-Rudolf Korte)

刘宏宇/译

刘立群/审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统一史·第1卷，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德）科尔特（Korte, K. R.）著；刘宏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97 - 8371 - 9

I. ①德… II. ①科… ②刘… III. ①德国－历史－1982～1989 IV. ①K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8746 号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德国统一史(第一卷)

——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

著 者 / [德] 卡尔·鲁道夫·科尔特 (Karl-Rudolf Korte)

译 者 / 刘宏宇

审 校 / 刘立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学谦 赵怀英

特邀编辑 / 欧阳甦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51.25 插 页：1.75 字 数：845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8371 - 9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3 - 2661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21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丛书

主 编 周 弘

编 委 会 周 弘 梅兆荣 程卫东 陈 新 刘立群
杨解朴 郑春荣 祝得彬 胡 珉

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字母排序)

顾俊礼	(Gu Junli)
黄平	(Huang Ping)
彼得·荣根	(Peter Jungen)
李扬	(Li Yang)
梅兆荣	(Mei Zhaorong)
史明德	(Shi Mingde)
霍斯特·特尔切克	(Horst Tetschik)
维尔讷·魏登菲尔德	(Werner Weidenfeld)
朱民	(Zhu Min)

总序一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产生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和不断的挖掘，如罗马帝国的衰亡、民族国家的出现、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滥觞、苏联的解体、新中国的复兴以及德国的统一（或“德国问题”）等都是为研究者乐此不疲的研究课题。

德国近现代的统一历程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19世纪末的德国统一和20世纪末的德国统一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前次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而后者则是用和平方式完成的。在这个和平的统一进程中没有武装冲突，对于外界来说，德国统一似乎就是瞬间发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的统一进程中没有其他形式的博弈。事实上，东西德统一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博弈，夹杂着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移民浪潮、街头政治、外交斡旋、制度兴替等扣人心弦而又耐人寻味的故事。

20世纪末的德国统一进程用和平的博弈方式改变了疆界，实现了民族统一，进而改变了欧洲的力量格局，并通过改变欧洲的疆界而重构了整个世界的力量格局。这个进程中都曾经历了哪些重要事件？牵涉到哪些人物和势力？在这些力量之间发生过怎样的较量或互动？采取了哪些行动和措施？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哪些政策、制度、法律、社会组织、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国家疆界的改变？所有这些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我们的求知欲。

为了满足这一求知欲，为了透过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现象，透过宏大的统一仪式和庄严的统一宣示，去挖掘东西德国最终在制度上的衔接、磨合和融合的深层故事，我们于三年多前启动了“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研究，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资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本项目的第一期成果，五本相关权威著作的中译本：四卷本的《德国统一史》，由慕尼黑大学的维尔讷·魏登菲尔德（Werner Weidenfeld）教授、弗莱堡大学的沃尔夫冈·耶格尔（Wolfgang Jäger）教授和慕尼黑大学的迪特尔·格

鲁瑟尔（Dieter Grosser）教授联合主编，以及一卷由当时在德国总理府任职的霍斯特·特尔切克（Horst Teltschik）以当事人的身份撰写的日志。这些著作因为获得了保密档案的特别使用权，并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

《德国统一史》的第一卷为《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即“政治卷”），由卡尔－鲁道夫·科尔特著，刘宏宇译，刘立群主持审校。该卷从政治的角度梳理了德国统一的进程，详尽地介绍了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在两个德国之间出现统一的可能时，如何通过权力的运用、决策的引导和政策的落实，领导了德国统一的进程。

第二卷为《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冒险之举：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却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即“经济卷”），由迪特尔·格鲁瑟尔撰写，邓文子翻译，胡琨审校。该卷从经济的角度梳理两德的统一进程，指出虽然从经济规律来看，在东西德之间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时机并不成熟，但是西德为了统一政治的需要，而东德则因为要“从沉船跳入冷水”，双方都采取了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政策，结果使德国马克的应用成为“德国统一的基石”（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

第三卷为《克服分裂：1989～1990年德国内部的统一进程》（即“社会卷”），由沃尔夫冈·耶格尔主笔，杨橙翻译，杨解朴、郑春荣等审校。该卷逐一介绍了东西德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包括西德联邦总理府、东德政府、西德和东德的各个党派、社会组织及社会团体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态度、政策和作为，以及这些力量随着统一进程的展开而发生的变化。

第四卷为《争取德国统一的外交政策：决定性的年代（1989－1990）》（即“外交卷”），由维尔纳·魏登菲尔德主笔，欧阳甦翻译，梅兆荣等审校。该卷从外交角度梳理和分析了两德统一的进程，重点讨论了德国与邻国之间的外交沟通，分析了一些主要国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生动地介绍了科尔和密特朗在欧洲经济与货币及政治一体化问题上的交易，苏联对德国经济援助的诉求，以及西德政府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就统一问题进行的外交。

《329天：德国统一的内部视角》，由霍斯特·特尔切克撰写，欧阳甦翻译，胡琨审校。该卷可以作为前四卷的简本来阅读，其中汇集了当时西德方面负责统一问题外交谈判的特尔切克在1989年11月9日至1990年10月3日期间撰写的工作日志，再现了德国统一进程的329天中西德联邦总

理府的日常工作，特别是科尔总理及总理府工作人员对德国统一进程的思考和决策。

关于东西德国在 20 世纪末叶的统一进程，不同的人群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利益出发，会观察到不同的现象，得出不同的结论。呈现给读者的这五卷本中既有丰富的历史故事，也有很多的结论性判断。在两德统一的问题上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结论和判断。作者们的结论和判断尽管不同，但是观察到的现象必然且自然地汇入有关两个德国统一的那段多层面、多角度、立体、庞杂而又能动的历史画面中，使我们对于 25 年前那曾经改变了欧洲乃至世界格局的历史事件有了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理解。

如前所述，本套译作的问世只是“东西德统一的历史经验”课题的第一期成果，未来还有很多研究工作要做，很多历史事实需要挖掘，很多问题需要分析和解读。德国统一涉及的领域广，层面多，层次深，而且当事人和研究者分布在俄美英法等多国，还需要集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金融史、法律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多领域研究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术研究，研究工作的难度会更大，内容也会更精彩，需要关心这段历史的同仁们与我们共同努力去探究。

这部卷帙浩繁的翻译丛书为我们提供了德国统一史中很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故事，而翻译难度也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回眼望去，三年多的辛苦努力过程中有许多中外人士提供了智慧或付出了努力，我仅在此表达诚挚的谢意。

需要感谢朱民和荣根先生，这套译作的动议来自与他们的思想交流产生的火花。要感谢阿登纳基金会的魏特茂先生，他积极地回应了我们对于资料和审校的要求。

在中国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前院长的支持是关键性的，而李扬前副院长则除了资金支持以外，还不断地给予精神鼓励。积极的支持同样来自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同事们，罗京辉书记、程卫东和陈新，他们的支持和参与坚定了课题组攻坚克难的信心。

这套译作的问世有赖于海内外两个团队的接力式努力：以欧阳甦为首，包括刘宏宇、邓文子、杨橙等在内的译者队伍，他们面对高难度的翻译工作而不却步，为项目的完工奠定了基础。由梅兆荣大使、刘立群教授和他的学生们、郑春荣教授以及我的同事杨解朴副研究员和胡琨副研究员

构成的审校团队保证了翻译丛书的质量：他们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校订了各卷。需要特别感谢梅兆荣大使，他以 80 岁的高龄，不辞寒暑，字斟句酌地审校了“外交卷”的书稿，还以顾问身份始终关心项目的进展并参与项目的重要决策。感谢刘立群教授在很短的时间内，带领他的学生团队，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政治卷”的审校工作。感谢郑春荣教授和杨解朴副研究员信守承诺、坚持不懈、善始善终地校订了“社会卷”。感谢我的主要助手胡琨副研究员，除了审校“经济卷”和《329 天》这两部译著外，他还是整个项目不可或缺的联络人，这项工作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还要感谢其他所有参与过翻译和审校的人员，赵柯、张浚、李以所、黄萌萌、李微、孙嘉惠、邹露、刘惠宇、王海涛、李倩瑗、唐卓娅、窦明月、丁思齐、孙浩林、陈扬、詹佩玲、赵飘，等等，有些人我至今尚未谋面，却感觉到他们的投入。

这套译作的问世还有赖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谢寿光社长的支持。在这里需要特别感谢我们多年的合作伙伴祝得彬编辑，他不仅积极参与了组织策划，还集合了海外翻译团队，并请欧阳甦担任特邀编辑，与他的助手杨潇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同事们一道，让难度很大的编辑工作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工。

虽然经过了三年多的辛苦努力，但是在这套翻译著作问世之际，我们仍心有惴惴，深知其中错漏在所难免，还望各位方家不吝赐教，以期在后面的版次中予以更正！

周 弘

总序二

德国与欧洲分裂的弥合：一段成功史

德国统一的实现与欧洲分裂的弥合是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事件。数十年来，人们已习惯事实上的东西对立。一切看来都是那样不可撼动。

德国与欧洲的分裂体现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 是世界政治东西冲突的组成部分；
- 是不同人类自我形象的表达：人类是作为自由的个人（西方的人类自我形象）还是作为“类本质”（Gattungswesen），以及与此相关不同的不同政治与经济秩序景象；
- 陷于争夺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交锋之中。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能够学习到什么呢？即我们在这一克服深刻分裂的历史重大事件之外，还能看到什么？

第一，不以战争武力形式应对危机。人们致力于预防冲突，避免战争发生。

第二，人们尝试借助和解政策保持人员往来，如有可能甚至加强这种往来。

第三，西方生活方式的吸引力有如一块磁铁。自由的生活条件、旅行自由、人员流动、社会市场经济、欧洲一体化——对于那些始终被隔绝于外的数百万人来说，这些充满了吸引力。

1989年11月9日，当作为分裂巨大象征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因此而倒塌时，进一步的行动在深思熟虑后得以实施，包括：

1. 采取的战略措施必须符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众的意愿。
2. 四个战胜国的同意与沟通必不可少，它们仍拥有决定德国地位的权利。这涉及建构关乎整个欧洲的未来框架。
3. 德国与波兰沿奥德 - 尼斯河边界的有效性在任何时候都不容置疑。两德统一应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的边界之内。

就此而言，须对许多细节作出规范：为统一实施政治结构、经济与行政事务、社会与法律状况的改革，这一切在高明的战略下得以实施：两个德意志国家商定一个货币联盟，以及一份落实政治统一的条约。人们在一体化欧洲的机制之上讨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辖区应如何整合进欧洲。在与战胜国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谈判中确保了所有法律问题的最终解决。1990年10月3日，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统一的德国作为主权国家成了欧洲和平秩序的一员。

这真可称为一个巨大的成功故事。并且，对于世界历史的其他舞台来说，无疑将从中受益良多。

维尔纳·魏登菲尔德
慕尼黑大学应用政治中心主任
欧洲科学与艺术学院萨尔茨堡总校校长

总序三

在德国统一进程 25 周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将该时期最重要的文献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在此表示祝贺。

20 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数亿人因此丧命。1945 年，几乎在二战结束的同时，又出现了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与东方共产主义国家对峙的所谓冷战。这一长达数十年的东西方冲突，伴随着军备竞赛、经济制裁、政治孤立、高墙和铁丝网。而所有这一切，在 25 年前出人意料地结束了。没错，结果是革命性的——一次被所有东西方负有政治责任者所接受的、和平的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层也对德国的统一表示赞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四卷本囊括了那一时期大量的重要政治文件、分析、描述和评估。读者可借此一览当时德国国内与国际层面重要决策过程的全貌，形成自己的判断，并为当下其他热点地区危机的解决找到答案。

德国统一成为可能，得益于国际政治领域之前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1967 年，北约出台所谓《哈默尔报告》，战略出现转向，即面对华约集团，不再对抗，而是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代之以对话与合作政策。安全与缓和政策从此被视为不可分割。尽管苏联在 1968 年 8 月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但在这一新信条的基础上，著名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前身）进程并未中断，并最终于 1975 年 8 月在赫尔辛基签订《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如何通过共同的缓和政策塑造未来，是这一东西方共同签署的文件所包含的重要原则。

当然，挫折也曾出现。1983 年，美苏在日内瓦关于削减中程核导弹的谈判失败，新的冷战阴云开始笼罩。然而，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1985 年 3 月担任苏共总书记后，苏联重启与美国的对话和裁军谈判，并在随后几年促成了迄今为止影响最深远的裁军和军控协定。

国内政治促使戈尔巴乔夫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并向华约集

团的盟国许诺，苏联不再干涉它们的内政。随后，波兰和匈牙利出现改革，并最终波及所有华约国家。这些变化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经济与财政问题已经失控，深层次的体制改革无法避免。

民主德国的统一社会党政治局在 1989 年秋认识到，民主德国经济与财政已破产。1989 年借道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等邻国逃往联邦德国的民主德国公民，超过 20 万。统一社会党关于旅行便利化的新决议导致了柏林墙的突然倒塌。

对于联邦政府，尤其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博士及其联合执政伙伴、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来说，重要的是，如何从 1980 年代所有华约国家这些戏剧性变化的背景中，得出必要且正确的结论。避免民主德国出现政治上失控的混乱并演化为暴力行为，是首先须要考虑的。

另外，应对此负责的还包括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四个二战战胜国，它们对于德国作为整体仍然负有法律和政治上的责任。庆幸的是，四大国时任领导人，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苏联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均令人信服且富有能力。他们与联邦政府一起，致力于推动德国统一尤其以和平与和谐的方式进行。

对于德国的重新统一，联邦政府毫无现成的预案，即使有，也都会是错的。1989 年与 1990 年之交，主要的工作是为不同层面的决策作准备、与所有伙伴协调并立即落实。在双边层面，主要是联邦政府与不停变换的民主德国领导人以及四个战胜国政府的密集谈判。同时还有美苏两国的双边对话。而多边层面的谈判，则发生在两个德意志国家和四大国代表之间（“2+4”谈判）。联邦总理利用欧共体（欧盟前身）和七国峰会的机会，为苏联和华约集团国家募集经济援助。经其努力，北约在 1990 年 7 月的峰会上宣布：向华约集团国家伸出友谊之手。

柏林墙倒塌 329 天之后，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和平地统一了。次日，联邦总理科尔在联邦议院宣布：“所有邻国对此都同意。德国历史上首次不再有敌人。”所有一切都和平地发生：德国统一了，欧洲的分裂结束了，欧洲也因此统一了。对抗的两极世界体系消亡了，新的世界秩序将要开辟。今天，我们称之为一个多极的世界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没错，这是一次革命，一次和平的革命，在 1989 年与 1990 年之交，没有一枪一弹。

1990年11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35国的所有国家和政府首脑在巴黎会晤，签署了《巴黎宪章》。其共同目标在于，建立从温哥华到海参崴的全欧洲和平与安全秩序，所有成员国能因此享有同样的安全。这是一种什么梦想！两次世界大战以降，对于整个欧洲以及北美来说，如此一个历史机遇首次出现。它的实现也将有助于中国和整个亚洲的和平。自那以来，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错过了许多机会，但是我们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不应放弃这个目标。

霍斯特·特尔切克

代序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按《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联邦德国），两个德国在分裂了41年后终于重新实现统一。

这次德国统一跟历史上的第一次德国统一完全不同。1871年的统一是奥托·冯·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而这一次统一，如果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1989年11月28日向联邦议院提出《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算起，到1990年10月3日举行统一庆典，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死一兵一卒，不到一年即完成了统一。这是以科尔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的伟大历史性创举。德国统一，标志着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美苏分治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的解体，对于今后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乃至德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深远影响。

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针对民主德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一条反对分裂、实行德国统一的“德国政策”。二次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四大战胜国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后来四大国为了其自身战略利益，逐渐把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并使之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联邦德国政府一再援用四大国“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以及“波茨坦协定”的有关条文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法律依据，要求实现在1937年12月31日时德国边界内的德国重新统一。1949年5月23日颁布的《基本法》的前言中也强调：“全体德国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德国统一和自由”。

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在科尔1982年10月担任联邦总理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 阿登纳政府时期（1949.9~1963.10）的尖锐对立阶段。在这段时期，联邦德国视民主德国为“非法机构”，强调联邦德国“在德国获得完全统一之前是德国人民唯一合法的国家组织”，即通常所谓的“单独代表要求”。1955年12月起，联邦德国推行“哈尔斯坦主

义”，目的是在国际上孤立民主德国。2. 艾哈德政府、基辛格政府时期（1963. 10 ~ 1969. 10）的解冻阶段。艾哈德政府虽然无意从根本上改变阿登纳政府对民主德国的强硬政策，但在1966年3月通过《和平照会》表示对民主德国不使用武力，表现了明显的灵活政策。基辛格政府修正了“哈尔斯坦主义”，为后来的“新东方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重要经验。但这两届联邦政府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即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主权国家、不承认奥德河 - 尼斯河线为边界以及关于柏林地位问题上，没有根本改变。3. 勃兰特政府时期（1969. 10 ~ 1974. 5）实施“新东方政策”和两德关系正常化阶段。勃兰特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以接近求转变”的新思想，1972年12月同民主德国签订了《基础条约》；1974年3月，两国各自向对方首都派驻“常驻代表”，从而为两个德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国际法基础。4. 施密特政府时期（1974. 5 ~ 1982. 10）的两德关系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期间，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经济贸易、邮电通讯、交通、科技文化、非商业性支付往来、环境保护、保健等协定。1981年12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首次访问民主德国，访问虽无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两德总理找到了共同点，即“深信再也不允许从德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

科尔政府时期（1982. 10 ~ 1989. 11）继承并发展了历届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果断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实现了德国统一。科尔政府的“德国政策”具有三大明显特色。

首先，对社民党人主政时期的“新东方政策”全面继承，大力推行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民族统一的感情。

“新东方政策”是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的创造，而科尔作为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曾对其予以猛烈抨击，挖苦其为“承认政策”。不过科尔执政后抛弃党派偏见，全面继承了“新东方政策”。他在1983年5月4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始终基于：《基本法》《德国协定》……《基础条约》……”。科尔在1984年3月15日发表的《处于分裂状态德国的民族形势报告》中强调：“目前，在德意志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但是只有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先于国家的建立，而且存在至今，这对我们的未来十分重要。”在科尔看来，德意志民族并不是通过国家来赢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自身历史、共同文化与传统、价值

观的发展确认的。所以，他把“德国政策”的重点放在培植民族统一感情上。于是，他对民主德国人道主义措施方面也全面体现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如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经济援助、提高民主德国旅游者的“欢迎费”、放松紧急家庭团聚限制，等等。

科尔在改善两德关系、增进民族情感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例如，他针对民主德国外汇紧缺的困境，力排众议先后于1983年和1984年分别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0亿马克以及9.5亿马克的贷款。他还不惜动用提高“无息透支贷款”、增加无偿经济援助、减免民主德国国债等手段，来推动两德经济贸易。科尔执政期间，两德还签订了许多重要科技、经贸协议。大众汽车公司跟民主德国签订的总值为5亿马克的生产线合同即是其中之一。

其次，积极推动两德高层晤谈与访问，激发民族感情，为两德统一寻找共同点。

科尔执政期间十分重视与民主德国领导人的会晤与访问。例如，科尔于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积极开展“葬礼外交”，先后两次与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晤谈，达成了“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有责任“竭尽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领土上发生战争”的共识。1987年9月，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应科尔邀请，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自两个德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次访问诚然是两个德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激发了两个德国人民之间早已存在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感情是实现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强大推动力；这次访问还使两个德国找到了更多共同点：双方一致同意要为欧洲的和平共处做出努力，“在德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应再发生战争，在德国的土地上必须创造和平”。这次访问，实质上是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结出的硕果。

第三，果断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迅速推进德国统一。

1989年秋，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民主德国政局发生骤变，11月9日夜晚“柏林墙”倒坍。当科尔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访问波兰的途中，以致他说“自己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待在不适当的地方”。但是，科尔敏锐意识到这对德国统一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科尔在事先没有同他的西方盟国美、英、法商量的情况下，便于11月28日在联邦议院发表了著名的“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公开把德国统一提到了世人面前。由是，科

尔以他的睿智和果敢，把德国迅速推上了历史性的统一之路！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的自由选举产生了以“尽快实现统一为目标”的民主德国新一届政府，加速了民主德国的自我崩溃和两德统一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周弘教授要我为她主持翻译的四卷本《德国统一史》的卷1《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年）》写篇序言。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写了上面一点认识，不足为序。

顾俊礼

2015年6月30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太阳宫宿舍 九如斋